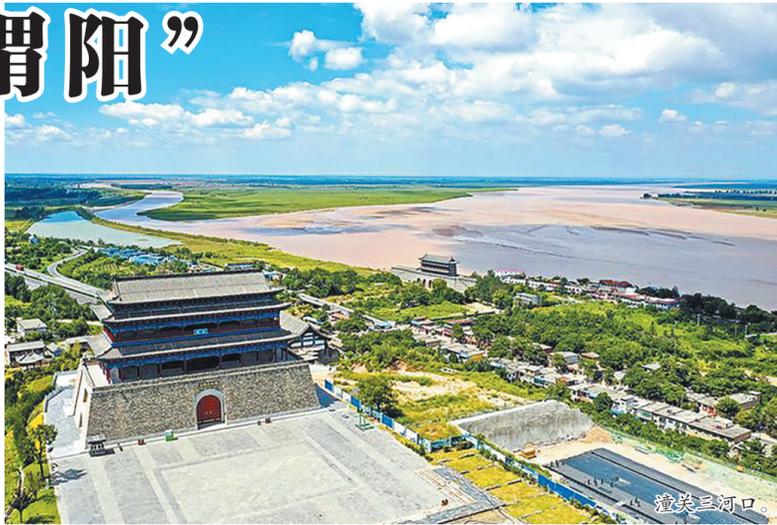


渭水汤汤话“渭阳”

郭发红



潼关三河口



编辑:柏志平 美编:张瑜 校对:白艳红

黄米馍馍

高志飞

在陕北,黄米馍馍可不只是一道美食,它是岁月沉淀下来的生活滋味,更是陕北婆姨们手中传承的温暖技艺。

制作黄米馍馍,可不是一顿随便便饭,毫不夸张地说,那是一场精心筹备的仪式,每一个步骤都饱含着对传统的尊重与对生活的热爱。

首先得精选硬黄米,这些黄米颗颗饱满,泛着金黄的光泽,如同陕北这片土地上的阳光一般耀眼。将硬黄米倒入大盆,加入足量的清水,让水没过黄米。这些黄米像是久旱逢甘霖的旅人,尽情地吮吸着水分,一夜过去,原本紧实的米粒变得圆润而富有弹性,仿佛积攒了一整晚的力量,准备开启一场奇妙的蜕变之旅。

晨曦微露,婆姨们就把浸泡好的黄米捞起,沥干水分,端到庄里的石碾场。石碾在岁月的打磨下,泛着古朴的光泽,稳稳地伫立在那里,仿佛一位忠实的老友,静静等待着这场一年一度的合作。婆姨们将黄米均匀地铺在碾盘上,伴随着毛驴“哒、哒、哒”的脚步声,石碾“嘎吱嘎吱”缓缓转动起来,在碾盘与石碾之间黄米被反复碾压,逐渐破碎、细化,纷纷扬扬地落下,化作细腻的粉末。婆姨们手持筛箩,轻轻抖动,把粘连在一起的粉末分开,确保每一处都能被均匀碾压。这过程看似简单,实则需要十足的耐心与细心,因为这是黄米馍馍口感细腻与否的关键一步。

黄米面制好后,要用细密的筛一遍又一遍地过滤,去除可能残留的杂质,此时的黄米面愈发柔细,如同初生婴儿的肌肤。在烧热的大铁锅里倒入黄米面,小火慢炒,婆姨们手持锅铲不停地翻动,生怕火候大了。随着温度的升高,黄米面的清香逐渐弥漫,一种来自大地深处的香气钻进鼻腔,让人忍不住深吸一口气。

炒好的面趁热加水,这可是个考验手功夫的活儿。婆姨们挽起袖子,双手探入面盆,熟练地将水与面搅拌均匀,揉、搓、按、压,一系列动作行云流水。揉好的面团放入盆中,置在热乎乎的炕头,盖上厚厚的棉被,宛如襁褓中的婴儿,即将在温暖中孕育成长。

终于,面团发好了,体积膨胀了一倍有余,表面布满了细密的气孔,像蜂窝一样。婆姨们满心欢喜地揭开棉被,将面团搬到案板上轻轻揉搓,排出里面的空气。随后,把面团分成大小均匀的剂子,双手快速地搓圆、压扁,再揉成一个圆鼓鼓的馍馍坯子。此时,篋帘早已被孩子们擦拭得干干净净,只等着将馍馍坯子整齐排列好上锅蒸。

随着锅盖盖紧,灶坑里的火熊熊燃烧,好似一场盛大的庆典拉开帷幕。不多时,锅边热气四溢,黄米馍馍的香气也溢出,那是一种混合着谷物醇香、发酵后的酸甜以及蒸熟后热气腾腾的独特味道,顺着门缝、窗棂飘散出去,弥漫在整个院子。“揭锅了!”伴随着一声欢快的吆喝,锅盖揭开,一大锅蒸开花的黄米馍馍映入眼帘,饱满圆润,仿佛冬日里绽放的一朵朵金黄腊梅,娇艳动人。咬一口,软糯香甜瞬间在舌尖散开,口感丰富而有层次,先是黄米面的醇厚,接着是发酵后的微酸,而后化作一丝甘甜,在口腔内久久回荡。

黄米馍馍,黄土地上最香的馍馍,承载着陕北婆姨们的勤劳与智慧,带着黄土地的深情,从古老的岁月一路走来,一路飘香。

在过去,它是关天关地阖家团圆的必备美味,热热闹闹地摆满一炕桌,一家人围坐,欢声笑语伴随着馍馍的软糯香甜,驱散了冬日的严寒,填满了生活的缝隙。如今,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,陕北的村落也发生了诸多变化,可黄米馍馍的香气从未消散。在远方的来客品尝到地道的陕北风味啧啧称赞中,黄土地的文化也随之远扬。在游子的手囊里,它是慰藉乡愁的暖心之物,无论走得有多远,身处何方,咬上一口,熟悉的味道便能瞬间将人拉回那片沟壑纵横的黄土土地,忆起窑洞的温暖、家人的笑颜。

它就像一条无形的纽带,串联起过去与现在,温暖着一代又一代陕北人的心房,成为黄土地永恒的味道印记。

秦味

渭河古称渭水,源出甘肃省渭源县鸟鼠山,像一条宽大柔软的飘带,横跨甘肃东部和陕西中部,最后系在了潼关的三河口之上。渭河这条飘带长818公里,其中陕西境内有512公里,飘带上凝结着关中4市(宝鸡市、咸阳市、西安市、渭南市)26个县(市、区),让三秦人疼爱有加。

《诗经·秦风·渭阳》有:“我送舅氏,悠悠我思……”。古人认为这是秦康公送舅舅重耳(即后来的晋文公)回国并思念母亲的诗篇。后人以“渭阳”代指舅父,陕西关中人则直呼舅家为渭家,“渭爷、渭婆”之称不绝于耳。又,司马迁在《史记·齐太公世家》中说,周文王与姜太公相相遇于“渭之阳”。如此这般,“渭阳”不仅有甥舅送别,还有君臣相遇,亲切而美好,伴着渭水源远流长。

依“水北为阳”论,渭河以北的某村、某乡或某县,均可称为“渭阳”。

长城之乡。渭水出甘肃定西市渭源县后,向东南方向流淌一阵,经陇西县城后偏南方向流去,而就在这转弯的北面,莽莽群山中,有一个乡名为渭阳。战国秦长城正从渭阳乡经过。有关部门给出了渭阳段长城的查勘成果大致是:渭阳乡渭阳村—渭阳乡三川村,长度1148米,走向为东南—西北。另据《陇西县志》记载,1936年10月8日,红军在渭阳乡本驮村与国民党军队发生激战。2016年10月,即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八十周年之际,“曹家峁战斗遗址纪念碑”于此地昂然耸立。日前,渭阳村口竖立一碑,上书:“新时代文明实践站渭阳村”。

文风之地。甘谷古称“冀”,公元前688年,秦武公伐冀戎,置冀县,为中国县治肇始之地,有“华夏第一县”之称。甘肃天水市甘谷县原有渭阳乡,后改为渭阳镇,再后并入新兴镇。原渭阳乡(镇)治所设在颀家村。相传颀家村是文祖仓颉的后代。《淮南子》记载,仓颉造字成之日,上苍为之感动,“天雨粟,鬼夜啼”。处渭阳之地的甘谷县第六中学,有门联为:渭阳乃文风之地人文荟萃鸾翔凤集贵在尊师重傅;读书是头等好事德才兼备鲲鹏展翅当须勤学笃行。

陈仓魏镇渭阳地。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陕西陈仓区魏镇李家崖一带迁来了一家老牌军工厂,官名“渭阳柴油机厂”。改革开放后,“渭阳”牌轻骑摩托车就出自该厂。在北方动力(原渭阳厂)社区,曾建有渭阳高中,并于全省兵工系统名噪一时。该厂子弟小学西分校,正是现在的陈仓区渭阳小学,对面是新建的

渭阳幼儿园。魏镇一带与周秦渊源深厚。据《史记》及考古发现,魏镇是中国最古老的镇,这里曾是周文王弟虢仲的封地,公元前687年为秦武公所灭,遂设魏县。魏镇上曾有渭河之会(今千河镇魏家崖村),乃秦文公四年(公元前762年)营建的都邑,秦居此49年;下有平阳,今阳平镇一带,秦宁公二年(公元前714年)迁都平阳,秦人居此37年。可以想象,假如秦康公送舅舅重耳到渭阳的话,魏镇当是最近之处。

岐山渭阳成景区。据《岐山县志》介绍,陕西岐山县在元代(1279—1386)共分为尚善、怀贤、崇德、栖凤4乡,其中栖凤乡(明代改叫阳遂乡)就有“渭阳里”。民国年间,全县设6区,改里为乡,其中第五区驻蔡家坡镇,所辖就有渭阳乡及其所属的18个村子。其实“阳遂”之称更早。《三国志·郭淮传》曾记载诸葛亮声东击西,但被郭淮察觉,终无功而返,这里“阳遂”即以“渭阳里”为中心的“渭阳乡”,今蔡家坡渭水之北。如今蔡家坡渭河段,有蔡家坡渭河健康运动公园,更有“岐渭”国家级水利风景区。

“咸阳有多大,渭阳就有多大”。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:“十二年,作为咸阳,筑冀阙,秦徙都之。”这是说秦孝公十二年(公元前350年),秦国将首都从栎阳(今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一带)迁到了今渭城区窑店镇一带。《三辅黄图·卷之一·三辅沿革》对“咸阳”给出了阐释:“咸阳在九嵕山,渭水北,山水俱在南,故名咸阳”。《史记索隐》对“咸阳”有类似解释:“咸训皆,其地在渭水之北,北阪之南,水北曰阳,山南亦曰阳,皆在二者之阳也。”可见咸阳本属渭阳。“渭阳古渡”又叫“咸阳古渡”,为秦中第一大渡,系关中八景之一。清人朱集义在《渭阳古渡》诗中写道:“长天一色渡中流,如雪芦花载满舟。江上太公何处去,烟波依旧汉时秋。”

高陵本属渭阳地。在今高陵区泾渭镇泾渭堡村陈家滩,可见自然景观“泾渭分明”。从泾渭分明景点返回高陵区,旋即会被浓郁的“渭阳”所包围:横贯东西的渭阳大道,自南向北的渭阳一路—渭阳九路,还有高陵区俗称的三阳寺塔(昭慧塔)——处在泾阳、渭阳、咸阳之北也。千年风雨,几度地震,塔身依然完好。实际上汉阳陵横跨渭城、

泾阳和高陵三县(区)。高陵境内大都是汉阳陵的陪葬墓。汉时曾在此设置阳陵县,高陵一度属于阳陵县辖区。阳陵县位于高陵区泾渭街道的东北方,阳陵以东,北临泾水,南越渭河与长安相望。三国时期,撤销阳陵县(即渭阳县)时,其辖地部分并入高陵。

临潼渭阳有村史。临潼区北田街道有西渭阳村、东渭阳村。其中《西渭阳村史简编》由本村人韦基智(华清池原文史室主任)和藺安兴(临潼民政干部)编著,于2013年10月分发至全村每户。西渭阳村文化墙对村史有介绍:西渭阳村和东渭阳村,该村还发现了一处8000平方米的汉代残留遗址。当然,渭南最有名的还属渭阳楼及渭阳中学。唐末诗人郑谷作有《渭阳楼望》:

千重二华见皇州,望尽凝波即此楼。细雨不藏秦树色,夕阳空照渭河流。后车宁见前车覆,今日难忘昨日忧。扰扰尘中犹未已,可能疏傅独能休。

诗人站在渭阳楼上眺望,向西可见京城长安。另据《临潼民俗调查研究》介绍,唐开元年间(713—741),临潼区花园乡望岗岭建有白云观,门联是“渭阳第一山;望岗双福地”。此处“渭阳第一山”当是站在渭阳楼上南望所怀吧。

斗转星移,薪火相传。渭阳楼由靖

国军将领胡亭齋贻,群众集资,复建于1924年成立的渭阳中学院内。渭阳楼为仿城楼高台建筑,坐北朝南,砖台座呈长方形,下辟南台券窗三孔,上置单檐歇山顶阁楼。于右任先生为渭阳中学题写校名,民主人士、时任校长李瘦枝先生为渭阳楼题写匾额。渭阳中学因处渭水之阳而得名,后更名为固市中学。1926年5月建立了渭北最早的共产党组织——中共渭阳中学支部,直属北方局领导。1928年渭华起义时,渭阳楼及渭阳中学成为中共渭北革命活动中心。

渭河末端的渭阳乡。大荔县官池镇,民国时(1912—1949)属渭阳乡。住所阳村——渭水之北沙苑之南,一座设有7个城门并建有炮台的高大城堡。城门上有对联:“渭水泱泱润黄土;阳光灿灿映金沙”。该村南依渭河与华阴市华西镇相望。据王凌琴《渭河上的阳村古城》介绍,阳村街上店铺林立,村里每月都有庙会,后来又设每月逢二、八日为集,古会加集市,阳村古镇成为附近村民的货物交易中心。由于城墙坚固,街道完整,人口众多,地理位置居中,因而大荔县沙苑以南的区乡政权,历来皆设立于此。解放前的渭阳乡政府,就设在阳村正街的“多公祠”里,县办高级小学设在老庙里。沙南地区的学子,都来渭阳古镇求学。1956年后,三门峡区建立,阳村属于峡区之一,部分村民西迁宁夏,其余人家皆向北迁移,分为3个村庄:东阳、西阳和北阳。有学者认为,《秦风·渭阳》如是注重耳回晋主政,然时局艰危,秦人必重兵护送至渭河之末,疑为此地也。至于南北朝时期著名的“沙苑之战”,以及《三国演义》第十三回“李擒郭汜大交兵 杨奉董承双救驾”中“李乐军到,会于渭阳”,当与此地相关,或

钩沉

陕北秧歌:黄土塬上的生命之舞

何明 杨浏

黄土塬,陕北秧歌在人们心底悄然萌动。随着一声清脆的锣鼓敲响,仿佛唤醒沉睡大地的号角,陕北秧歌的热潮瞬间席卷而来。瞧,那秧歌队伍犹如一条五彩斑斓的长龙,蜿蜒在陕北的沟沟峁峁。领头的伞头,手持花伞,步伐矫健,花伞在他手中上下翻飞,时而如绽放的花朵,娇艳欲滴,时而似灵动的鸟儿,轻盈跳跃。伞头的每一个动作,都蕴含着对生活的热爱,每一次转身,都仿佛在向天地诉说着陕北人民的坚韧与豪迈。

紧随其后的是身着鲜艳服饰的男女老幼。他们的衣衫,红得似火,绿得像翠,恰似黄土地上盛开的繁花。他们舞步,轻盈跳跃、稳健豪迈,脚下的黄土仿佛成了他们最广阔的舞台。

陕北秧歌的节奏,是生命的律动。锣鼓声震耳欲聋,如同黄河的波涛,汹涌澎湃,一浪高过一浪。鼓点急促时,如万马奔腾,气势磅礴,让人热血沸腾,鼓点舒缓处,似山间清泉,潺潺流淌,沁人心脾。那节奏,敲打着陕北人民的胸膛,激发着他们内心深处的情感。每一次的敲击,仿佛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沧桑变迁,每一声回响,都凝聚着陕北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执着。

扭秧歌的队伍中,有老人,有孩童,他们都沉浸在欢乐的氛围里。老人们脸上洋溢着慈祥的笑容,那笑容,藏着对往昔岁月的回忆,也有着对如今生活的满足。他们的舞步虽不再轻盈,但那份对秧歌的热爱,却丝毫未减当年。孩子们则像欢快的小鹿,在队伍中穿梭嬉戏,

他们纯真的笑声,如同银铃般清脆,为这热烈的秧歌增添了几分灵动与活泼。

陕北秧歌,不仅仅是一种舞蹈,更是陕北人民生活的写照。它是农忙之余的尽情释放,是丰收之后的喜悦表达,是婚嫁娶时的情感寄托,是逢年过节的欢乐庆典。它承载着陕北人民的历史记忆,传承着这片土地的文化基因。这舞动的旋律,是陕北人民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面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

岁月流转,陕北秧歌依旧在黄土地上热烈地舞动。它如同黄土地上永不熄灭的火焰,照亮了陕北人民前行的道路,温暖着每一个热爱它的心灵。在这黄土塬上,陕北秧歌将永远跳动着生命的脉搏,绽放出璀璨的光芒。

民俗

澄城城隍庙散记

柏峰

县安里镇高槐人惠丞哲,后更名为张风仪。此人史书虽未有记载,但有流传至今的民间故事,说明清末民初,社会纷乱不已,惠丞哲跟随家人流亡山西,途中父母为匪所杀,被清户部员外郎张崇贤所救,收为义子,更名为张风仪。后因勤苦读书,科举得中,被授为国史馆编修。东南海战起,张风仪参加平寇有功,擢升文华殿学士,兼礼部侍郎。然而,他始终不忘故里之情,肃杀澄城一带的横行恶霸,除暴安良、公正清廉,造福乡里,百姓称颂,故供奉城隍庙。

城隍作为城市居民所信仰的神祇,其庙宇建筑都十分讲究。一般说来,广延能工巧匠,选取风水团聚之地,精心设计施工,代表了当时建筑艺术的较高水平。澄城城隍庙就是这样的,拾级而上,可见其建筑精巧而秀美,颇有特色。

主楼为建筑主体,挺拔而起,重檐三滴水歇山顶,其巧妙之处在于用32根柱子架梁叠木建成,10根通天柱——喻示城隍神祇的至高地位,可通天庭,而顶部为八卦藻井,饰“火焰宝珠”图案。据《周易·系辞下》云:“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”,其作用是“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

之情”;而“火焰宝珠”图案,可以追溯到佛学初盛的北魏时期,象征着祥光照耀大地——仅仅主楼顶部之八卦藻井与“火焰宝珠”之图案,标识出我国以儒道释为核心的文化特色。

主楼分为上下两层,第二层建有空中回廊,以供登楼远眺。东西两侧均为十字歇山顶方形楼,各用14根柱子架梁叠木建成,突出我国古代以“礼”为核心的建筑文化体系,有其独特风貌。

关中东部,各个县城均建有城隍庙。例如,三原、韩城等县市,尤以武功县为胜,入全国四大城隍庙之列,至今保存完好,其建制规模更为宏伟。澄城城隍庙的不同之处,则是更强调城隍庙不仅是信仰的庄重场所,也是老百姓娱乐活动之地。

在某种意义上说,澄城城隍庙不仅是演奏音乐的楼台,同时也肩负着传播古代主流文化思想,即儒家学说的重大责任,其传播方式主要有三种:

其一,通过官学进行教化。即以澄城为例,在宋代就设有“县学”,亦称“儒学”,属县办官学,是生员读书习文的场所;清代则有“义学”,这是清政府倡导,民间自为筹划,建塾延师,为无资就读的贫寒学童设立的学馆(《澄城县志·文物志·教育志》1991

年)的几种办学的形式,均以官方出面或者提倡为主,是正面的主流教化形式。

其二,兴办私塾与书院。私塾教育,由来已久,春秋战国时代,孔子是私塾教育的创办者,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云:“孔子以诗书礼乐教,弟子盖三千焉”,而“秦汉大一统而私学灭”(李东君《中国私学小史》),唐宋时期,私学又起,明清则私学大兴,而澄城据明嘉靖《澄城县志》记载,“宋时澄城乡村已有私塾”,此后绵延。唐宋时期,我国出现书院,南宋硕儒朱熹所讲学的江西庐山脚下的“白鹿洞书院”久负盛名,明清陕西有著名的关中书院,而澄城在清代则有水东书院、玉泉书院、壶前书院等,后来笔者曾前去考察,遗址犹存。

其三,通过社会日常礼仪活动进行。诸如迎送、节日、嫁娶、丧葬等,而每年在固定时日祭祀被封为城隍的神祇,便是其中占据重要地位的社会礼仪活动,这种礼仪活动具有直观性与广泛的参与性,以期潜移默化,教化群众。

由于古代一般民众少有机会接受正规学校教育,有效的方法便是通过雅俗共赏的音乐和戏曲达到教化目的,俗称“高台教化”,即通过蕴含其中的宣扬社会主导思想的文学艺术形式来传播。

澄城城隍庙作为我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表现形式,不但见证了古代精美的建筑艺术,还从侧面生动地表现出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和情感态度,为我们解读中国文化特质及其演变打开了另一扇窗户。

胜迹